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 一 1918 年——1927 年
- 二 1927 年——1949 年
- 三 1949 年——1976 年
- 四 1976 年——

没有哪一种哲学或理论,能在现代世界史上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有如马克思主义;它在俄国和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已数十年,从根本上影响、决定和支配了十几亿人和好几代人的命运,并从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俄国不在本文范围。这一事实在中国是如何可能的?它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怎样?显然是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现代思想史课题。

而且,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由实践行动所提供的大量现实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意识、葛兰西强调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和“文化批判”等等,都由毛泽东晚年以其东方式的形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广泛实践过。尽管二者仍有许多重大差异,但重视思想意识、伦理道

德、文化批判、人的改造等意志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色上,却有许多近似或相接近的地方^①,从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也许可从理论上映证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的一些问题。因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研究,对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或许也将有所裨益。当然,本文不过是在目前的可能条件下作点尝试而已。第一次尝试总不会成功,希望失败可以给后来者以某些借鉴。

一 1918年—1927年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少数留学生知识分子便知道并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轮廓。其中,朱执信是最著名的一位^②,但在中国及知识界并没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是相当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论著作长期以来并无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

① 参阅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第九章,人民出版社,1984,北京。

② 参阅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05~3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北京。

主义和列宁主义。因此第一个问题便是,在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

1918年至1919年初,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表示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赏、支持。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可说是第一篇真正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文,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曾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本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石。但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才起步,无产阶级也非常薄弱,连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得可怜,这一基本学说的实用性质和实用范围都非常有限。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要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如果细看一下,便会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

李大钊说: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① (1919年5月)

陈独秀说:

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的正统派或是柏因斯泰因的修正派,都不过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两派的主张彼此正相反对如下表:

^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176—177页,人民出版社,1978,北京。

共产主义的主张
阶级战争
直接行动
无产阶级专政
国际运动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
劳资携手
议会政策
民主政治
国家主义

.....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①。(1921年7月1日)

如前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又是与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选择(不走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道路,而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联在一起,正如上引李大钊的解释,马克思关于过去(历史观)现在(经济学)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都由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络起来”。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长久的文化传统和观念遗产,这些传统和遗产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不但毫不相侔,甚至相互冲突;那么,这种对于他们是全新的观念、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被他们所接受呢?除了救国这一现实急需

^①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外,有没有什么文化心理结构上的依据或条件呢?

本来,从晚清起,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在中国便一直深入人心风靡不衰,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到年轻一代的知识者,曾非常迅速地抛弃千百年“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的历史观和“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论,似乎并无任何思想困难或情感障碍便接受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它似乎说明,中国由于没有真正强烈的宗教信仰,知识者仍然习惯于用自己的理性来判定、衡量和估计事物,这种理性是一种经验论的理知,排斥着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而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感受和积极意念连在一起。所以它没有“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情感上的阻碍,也没有从宿命论角度来安然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结论。而仍然追求和呐喊着自立自强和刚健奋起。“自强”“刚健”本是儒学传统,它却可以在西方输入的进化论观念下成为近代精神。可见,尽管近现代传来的好些西方学说,在某些具体内容、观念上与儒、道、墨、法的中国传统相背离、矛盾甚至相冲突,例如上述的进化论与历史循环论、退化论的背离,“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与“和为贵”(儒)“弱者道之用”(道)的矛盾,却可以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精神”、“国民性”)上接受和融会他们。这所谓“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基本特质,便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

也正因为中国的实用理性使情感经常处在理智的控制、干预和渗透下,使人们的意念、信仰、希望以及意识形态经常要求某种理性的解释,进化论在中国便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实证的科学学说来对待和研究,而是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

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①。人们是怀着一种情感态度去接受、理解和信仰它的,但这是一种理知认识后的信仰,而不同于纯情感的倾倒或服从。正如同以前中国士大夫之信仰孔夫子不同于西方人崇拜上帝相信耶稣一样。进化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和情感信仰,指导中国知识分子去生活和奋斗,具有着理性的特征。

显而易见,由进化论走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群中,是顺理成章,相当自然的事。李大钊、陈独秀当年便是如此。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歌颂着“青春”“今”,呼喊着重“新的、旧的”,追求进步,肯定进化。陈独秀则曾直接以“进化论”与“人权”“社会主义”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人所共知,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也是进化论的信徒。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替代进化论,它优越于后者之所在,对当时先进知识群说,至少有突出的两点。第一,它更为具体地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不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或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而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很大的理性说服力。中国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儒学传统,有着从经济(食货)、地理各种社会物质存在条件或方面去研究和论证政治盛衰、民生贫富的思想学说。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和“庶之、富之、教之”(《论语》)的思想观念,它们一直未为人们所遗忘。尽管有宋明理学的冲击和统治,历代治世能臣从桑弘羊到张居正的形象,不但被史书所详加记录,而且基本上为士人们所肯定。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对不倦地向西方寻求救亡真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先

^① 参阅本书《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选择进化论后又选择了唯物史观,应该说是起了作用的。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亦即没有在情感、观念上强烈的排拒感、难以接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中国人由于长久的传统观念和伦理情感的排拒,一般较难接受弗洛伊德恋母情结论和极端个人主义,对比具有强烈宗教信仰者难以接受“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似乎也表明这一点。

其次,就具体内容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复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之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更分别构造了他们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大同远景。^①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之,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

这里,重要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一样,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对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②?”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1949年的胜利和解放初关于“社会发

① 参阅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② 拙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末章。

展史”(即唯物史观)的大规模的宣传,使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好些宗教徒和非马克思主义甚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教授、哲学家、历史学家,都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和相信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这与他们由热情地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独立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但这种由‘人道’(政治)而‘天道’(哲学)的心理转移,不又正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么?他们不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这一传统么”^①,甚至像顽强固执的熊十力、梁漱溟,也都在他们的晚期学术著作中,表露出或反射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肯定态度^②。

当然,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大陆以外的)并没有接受而且许多还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除了政治原因外,思想上的一个主要焦点是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或积极反对)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在实践上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

① 拙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② 参阅熊的《原儒》《乾坤衍》《人心与人生》等著作。

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

这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人民无数次高声诵读的毛语录,虽然并不能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止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常常是从阶级斗争来看一切,包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形势和要求来认识、研究以至描述、区别阶级。无论是陈独秀 1923 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或毛泽东 1926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主要是从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情况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因此着眼点和着重点主要不在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究^②,而主要在描述各阶级在当时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处境、状态和它们在经济特别是在政治上的态度和可能性。从而收支状况、生活水平代替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的地位,常常不是生产中的地位,而是分配、消费中的地位,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政治态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376 页。

② 直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才有了初步的科学研究。

更成为注意的重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分析和阶级观念更接近于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战略论著中的阶级分析,而不接近《资本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的基础分析。它实际是从阶级斗争(政治)来观察、论证阶级(经济),分析阶级也是为了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为了当前革命的急迫的实用需要。^①

阶级斗争学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率先传播,得到大批青年欢欣鼓舞的接受和信仰后,很快就有具体行动的落实。首先是建党,其次是“到民间去”。

建党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有严格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共产党组织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开始领导、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上述思想理论上的阶级分析也正是在有了这种阶级斗争实践之后才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列主义创始人以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那种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论著,中国现代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救亡斗争,使得人们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书斋研究,而把主要的力量、时间和注意,集中在急迫的斗争实践上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实用理性和集体(家国)意识无疑促成了这一特征。所以,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无不涂上这样一种直接为急迫的现实斗争、为当前的社会需要服务的色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中国现代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渗入下,具有了这样一种单纯和直接的实用特征。

有学者研究胡适时,曾解释为何杜威与罗素大体同时来华讲

^① 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略有不同。但那是政策性的文件,也没有从理论上分析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土地制关系中的各阶级。

学,杜威的影响却比罗素要大得多,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的分歧,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型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① 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在上述的中国现代条件下,本来十分重视理论、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也被染上了“有效即真理”和要求直接服务于当下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因素。这一点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呢?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如何比实用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呢?

除了现实的原因(救亡图存)外,又似乎仍有其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就传统心态说,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和信仰模式,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但也有与实用主义并不相近的一面,即实用理性更注意长远的效果和具有系统内反馈效应的模式习惯,即承认有一种客观的“道”支配着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理性并非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且也是认识(或体认)道体的途径。正是实用理性这一特点,使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更易倾向于前者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未来世界的理想,而实用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生物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没有这种理论和理想;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肯定客观世界及其普遍规律的存在,是重视对这种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论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台北。

证的,而实用主义则从理论上排斥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就写出了有关中国现实局势和奋斗前景的好些颇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今日看来,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党派和其他的思想理论学说(例如胡适的政论文章),他们对中国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具有比其他理论学说更有说服力的深刻性。这倒正是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论证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确乎处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处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阶段以李大钊的理论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在于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特色使他不同于陈独秀,而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倒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是民粹主义的色彩。^① 李大钊大概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① 参阅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1970, NY Atheneum, 此书强调提出了这一论点。

.....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晨报》）

民粹主义一般有两个相互结合的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这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像这样号召到农村去，这样重视农村，歌颂农民，在陈独秀等人那里是看不见的。但这又并非李大钊一人的特点，在他前后的章太炎、鲁迅（早期）、章士钊、梁漱溟、毛泽东等人那里，曾各以不同的形态闪烁出这同一特色。可以看出，在中国近现代，始终有着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以及上述章太炎等人为突出代表的民粹思潮的倾向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待资本主义基本采取赞

扬、肯定(前者)还是保留、否定(后者)的不同态度上,前者更注意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工业生产带来的社会幸福、国家富强,后者则更着意如何能保持“纯净”的农村环境(广义)、传统美德、精神文明等等,以超越资本主义。这确乎与俄罗斯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有某些相似。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像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没有俄罗斯农村公社的残迹,以及近代一些其他重要原因,中国没有或没来得及产生纯粹的民粹派的思潮、组织和活动。中国近现代所有的“志士仁人”都是自觉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从而具有民粹思想的人经常处在某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们经常并不否定近代大工业、大生产,同时“西化派”中也有不少人揭发、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所以上述划分便只具有非常相对的意义,只是某种总的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并且只是从客观上和整体上来说的。在各个具体人物身上,又还有各种具体矛盾的复杂情况^①。但是,本文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指出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近现代民粹思潮颇值得重视。正由于它没有像俄国那样具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独立性格,没有受过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的尖锐批判,从而它一开始便渗入了马克思主义之中,而发生了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不一定全是坏的。许多方面,例如重视农村和农民,是符合中国实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的确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毛病,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李大钊宣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道德主义。李大钊在一开始介绍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便又特别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曾用互助来“补充”阶级斗争。

^① 例如,大概只有鲁迅超越了这种差异,但也仍然在情感思想的深层存留着矛盾和冲突。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规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他(指马克思)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始。……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①(《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

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一日消灭,不过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加倍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习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2—224页。

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这一特征与上述民粹主义特征互相紧密地联系、溶合和统一在一起,它们是在同一个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好像与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有些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这种“互助”、“协合”和“改造人类精神”是强调建筑在所谓“尊劳主义”,即以下层人民的劳动为基础的: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做“尊劳主义”(《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晨报》)^②。

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③。

① 同上书,第194页。

②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也特别强调体力劳动、体力活动的快乐,参阅《青年毛泽东》。

③ 《李大钊选集》第175—176页。

从一开始,李大钊便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即所谓“心与物”“灵与肉”相提并论,要求作双向的同时改造。总之,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相结合,阶级斗争与在劳动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就是李大钊所理解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这与从先秦墨家以来的中国下层的传统伦理不有某种接近之处么?从而,它与置根在同一小生产传统土壤上的儒家的仁爱伦理,又有了可以相通的一面。这一点,在后来的发展中便展现得更清楚了。

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上面这些材料只是些思想文献,论证只在纯粹理论领域,但活的思想史正是现实历程的一面镜子。通过镜子里的这些特征,深刻地反射出了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

这条道路和命运确乎不偶然,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倾向。因此,只有清醒地及时认识它,研究它,才能发展它的长处和优势,避免它所带来的缺陷和弊病,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可惜的是,我们的认识、研究似乎都太迟了一点。

二 1927年—1949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于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实践密不可分,粘连一起,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没有取得独立的形态,从而其阶段的区划

标准也没有独立的自身尺度,基本取决于社会政治斗争的几个主要关键环节而形成不同的阶段。大体说来,从1918年到1927年大革命,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早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是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胜利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是毛的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以及其片面发展的时期。从1976年以后至今是新时期。

第一期到第二期的中介人物,从理论上讲,主要似应是瞿秋白。

瞿秋白1923年由苏联回国,重办《新青年》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①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同时,又提出“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的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即科学性的方法论,他要求以科学革命性的方法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在二十年代,瞿秋白依据唯物史观评论过科玄论战,在此文中,又提出了自由与必然的哲学问题。也正是瞿秋白,这时候把“辩证唯物论”介绍到中国来。如上节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获得接受、传播和打响的,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一些人是以这种历史观作为社会观、人生观来身体力行的。“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之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史观。……亦可方为一种社会观”^②。但到了瞿秋白,则显然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来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说历史、社会、人生、革命。应该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① 此文据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为瞿作,见该书第5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成都。

②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选集》第287页。

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即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①

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②。

所谓“动”就是斗争,就是矛盾,

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是以规定变动的历程。^③

与李、陈诸人主要从日文、英文译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瞿秋白主要是从俄文论著中了解。因此,比起马恩著作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更成为其介绍、论证的主要依据。从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论的重点转移,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某种变异和发展。即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已经有大量关于自然界各种辩证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论证,但它们多半是为驳斥杜林而表述的观点和作为材料的思考笔记,并不像唯物史观那样,真正自觉构建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严整体系。因之,不仅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

①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讲义》1923年,转引自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131页。

②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讲义》1924年2月,同上书,第131,132页。

③ 同上。

意识,而且是对整个存在和意识即心物作哲学的唯物论论证,固然是一次极大的扩展,但同时也带来某种外在框架公式的主观主义。这一点到斯大林《联共党史》中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从自然本体论推导出历史发展论,将马克思主义形式逻辑化、框架化、教义化,便变得极明显了。

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瞿秋白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到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通俗宣传,的确在普及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使得年轻一代不必再像上代人那样,经由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走向唯物史观,而是直接由此而接受、信仰这种既普遍适用又非常“科学”的对宇宙、自然、社会各种现象的解释,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引导人生、参加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与其他各派现代哲学唯心论划分界限。这就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①。这一特色恰恰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的哲学思想相吻合^②。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也提出“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则显然是受苏联拉普派的影响,尽管苏联后来清算了拉普派,但在中国并没作这种消除,瞿秋白当年的这一提法对于后来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如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观指导创作方法,等等。这一点也与毛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由于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行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中国各阶级、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析和各种文化思想的批判等等。这些均非本文所能详论,下面只能作点概略叙述。

① 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这也是艾思奇《大众哲学》与李达《社会学大纲》的差异所在。

② 参阅本书《青年毛泽东》。

首先,应该指出,在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支持彭湃、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和提出要重视武装斗争、军事力量这三个有关中国革命战略的关键问题上,瞿秋白也是承上启下,即上承陈独秀、李大钊建党和“到民间去”的思想,下启毛泽东等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和新主张。

在党中央的领导者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热烈赞扬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陈独秀、彭述之等都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这篇重要著作(指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机关报《向导》上未能刊登完。瞿秋白则高度称赞毛泽东的意见,……立即为之作序……交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单行本,以便广为流传,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他在序言里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他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上去奋斗”。^①

支持农民运动,是与瞿秋白把反封建主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另一为反帝)有关,这与张国焘等人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从而低估反封建任务是不同的。如张国焘所回忆,“他(指瞿)……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的目的是反封建”。因而,瞿由注意武装斗争进而重视武装农民,即把武装革命与民众运动(当时这二者都已存在)结合起来。“瞿秋白认为,既需要‘武装革命’,又

^①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242—245,251页。

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①。“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瞿秋白愈加重视武装问题。他……强调说明，‘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农民的问题只有‘实力斗争才能解决’”^②。

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指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民众的武装暴动’，‘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立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③

在1927年12月瞿写了《武装暴动问题》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各省农民此起彼落的武装暴动”，从而“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必需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和逐步“扩大”^④。这显然是对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武装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地区的肯定和总结。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战略，是瞿秋白在理论上首先概括出来的。

但是，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当然，瞿秋白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他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影响，重复了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⑤

①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242—245,251页。

② 同上，第270页。

③ 同上，第301页。

④ 《瞿秋白选集》第381—387页，人民出版社，1985，北京。

⑤ 《瞿秋白选集》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85，北京。

这也正是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承上启下地位所在。

瞿秋白是比较典型的近现代知识分子^①。他的文化教养、思想情感、观念习惯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与西方文化教养的某种混合物,而与毛泽东那种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的乡土特色很不一样。他之肯定农村、工农武装、军事斗争、游击割据,是纯理论认识的结论。他在行动和情感上,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能成功地实践和领导这种农民武装的军事斗争,便仍是问题^②。但从理性上认识和肯定这条革命道路,倒正好反映出,只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或马、列的某几条原理作为依据,便能作出上述符合革命实际的论断和主张。这又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起了作用,不必要抽象玄思,不必要搬用经典,从实际状况中概括出经验论的理性结论,并赋予它以清晰论证的理论形态,便足以指导行动了。瞿秋白在理论上这样做了,毛泽东却首先是在实践中这样做的。

除瞿秋白外,蔡和森是具有突出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年代他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概括、总结当时斗争进程的长篇报告和文章。蔡的这些论著对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重要意义。例如,蔡1926年总结在对待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等问题所谓“一派右倾,一派左倾”(前者指马林(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后者指张国焘、蔡和森自己、刘仁静)等等的论述,1928年六大时,一贯“左倾”的蔡却从实际情况的分析出发,对瞿秋白“不断高涨”论进行尖锐批判,等等,便是饶有兴

① 参阅本书《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

② 参阅本书《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

味的问题。且不论是非曲直尚待进一步研讨,但从下面摘引的蔡当时在党内民主问题的意见,足见蔡善于注意总结经验,是有敏锐的理论眼光的:

……另一方面,民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里完全是听从号召的士兵。……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工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 and 铁的纪律的一切自由。^①

可见,由来以久,积习已深。这种由来和积习也正是小生产封建传统习惯势力的渗透。自列宁党的模式建立以来,“铁的组织 and 铁的纪律”使共产党不断在一些东方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保证作用。但如何把集中与民主统一起来,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从而在制度上予以完满的论证和解决。蔡和森在党的少年时代和那样紧张激烈的革命环境中,便发现和提出这一问题,是很有价值的。蔡不幸过早牺牲,没能充分发挥他青年时代与“实践家”毛泽东齐名的“理论家”的才能。

除了瞿、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物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和主张,本文不能逐一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基础上,如何能走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如何具体地实践农民武装革命战争道路。这,便正是毛泽东的主题。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在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草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件,描述论证了农民武装割据的小块红色根据地为何在四周的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状况和原因,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并以土地革命作为发动群众的根本基础。从而,游击战的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和土地革命,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关于毛泽东,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写了许许多多,估计还将是一个长久讨论的题目。本文暂不拟对此饶舌过多。这里只想着重指出,毛泽东首先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不断在战争中战胜敌人而获有威信和地位的。由于对中国国情——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封建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十分熟悉,^① 以及对中国农民起义传统的留意,对《三国演义》《老子》的谙熟,和他素来主张身体力行,重视亲身实际经验同传统中国哲学的修养,^② 使他比其他人都更能在一场以农民^③ 为战斗主体、以农村为周围环境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如鱼得水,胜任愉快,最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毛以这种优胜条件和几次胜利战争在革命军队的广大干部中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领导的威望。

毛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和《论持久战》(1938

① 从上层的文人、墨客、士绅、官吏到下层的流氓、无赖、兵痞、乞丐,毛都打过交道而应付自如。诋毁毛的《张国焘回忆录》中也承认在他们领导层中,只有毛能对付三教九流等各式人物。

② 参阅本书《青年毛泽东》。

③ 毛诗《秋收起义》(1927年):“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注解,“党旗上的锤头当时常被误认为斧头”,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年5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为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毛的许多论著的论述形式似乎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思维的实际过程却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

从时间的条件说……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①

这显然因为中国现代游击战争是一种具有特殊经验的战争,不是搬用书本或套用一般的战争公式所能规范。

与此相关连,也是从战争经验出发,毛特别重视事物变化进程中能起决定作用、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

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致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7页。

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①

与此相关连，战争中的指挥者、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的突出和重要，自然为毛所特别注意：

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②

因此，在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便要注意冷静地、清醒地认识客观实际：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包括敌我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③

毛的这些思想用他后来常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来概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0页。

② 同上，第166页。

③ 同上，第165—166页。

也就是重视矛盾的特殊性、重视主要矛盾、重视主观能动性和把唯物主义反映论作为方法论以认识从而指导实践行动。正是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毛在十年内战时期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种种客观情况,概括和制定了的“以十当一”(不是硬拚)、运动战(不是阵地战)、速决战(不是持久战)、歼灭战(不是消耗战)等一系列行之有效非常成功的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抗战初期,又根据世界局势和敌(日)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条件、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人口、国土、自然条件等等)的全面、详尽、细致的分析描述,提出了抗日战争必将是经历战略退却、相持和反攻三阶段的持久战,反对悲观失望的亡国论和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更加具体地发展了上述战略战术,总结为十大“军事原则”:“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④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等。

这确乎是现代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战略总结,它是具有从这个军事史上的特殊上升为一般的哲学意义的。

中国是一个有军事传统和军事思想遗产的古国。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中,我曾指出“兵家辩证法的特色”:“第一,是一切从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必须非常具体地观察、了解和分析各种现实现象,重视

经验”；“第三，在这种对现实经验和具体情况观察、了解、分析中，要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错综现象中发现和抓住与战争有关的本质或关键，……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繁琐的细部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第四，……客体在这里作为认识对象不是静观的而是与主体休戚相共的，是从主体的功利实用目的去把握的”。毛的军事思想的哲学明显地近似或符合这个中国古老的兵家辩证法，而与西方的辩证法根本不同。这个辩证法是与主体实践行动密不可分的辩证法，从而它也是认识论即毛的“实践论”。

那么，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显然，所有这些与剩余价值理论、与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并无关系。但它与辩证唯物论却有关系，被毛泽东运用得很熟练的可说是实践中的中国传统的兵家辩证法，后来便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改造和表述出来了，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中国实际（农民革命战争）和传统（兵家辩证法）而中国化了。

毛泽东在他集中读马列书最多的延安时期，大部分也是注意辩证唯物论；而有关历史和历史唯物论，注意重点也在革命和阶级斗

争。毛自始至终特别重视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与学习。^① 毛泽东没有停留在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的概括总结上,而是努力把它们很快提到哲学的高度。这就是从内战时期《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时期《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晚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一系列哲学论著。所谓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把马、列原理原则当作既定的教条公式并由此出发判断现实、决定问题、制订政策,毛泽东要求从实践经验出发。毛在《实践论》则以心理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提出由感觉知觉到概念、判断推理再服务于实践,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这个哲学认识论中,突出地强调“直接经验”(亲知),强调“知行统一”。“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其实也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干就是学习”的直接提升和概括。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前述《战略》中重视抓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思想的发展。所以,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些哲学思想主要是依据他自己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上升而来。尽管《实践论》一开头就提到认识与人类生产活动以及与近代大工业的生产力相关,但完全没有历史

① 可参阅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的一些记载,如“五本书的批注,只有头两本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上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第72页)。当时毛曾认为“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第48页)1946年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时“在‘阶级社会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的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7页)。“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先后写了两大段文字,重申并发展了上述重要观点,‘二千年中,大规模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第203页),等等,等等。

地从认识对生产实践(从而与科学技术)的“依赖关系”中来具体论证,也没有历史具体地从认识对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中来论证。而是先从个体心理的过程描述再跳跃式地推论到社会、历史等现象,以建立“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两阶段和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的“两个飞跃”的认识论全程。这是从辩证唯物论来讲认识论,而不是从唯物史观来讲。

毛把整个哲学看作是认识论,这种哲学认识论又主要是作为方法论来指导现实斗争的实践活动,因此,“自觉能动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强调,便成为这一认识论的主要特色。《论持久战》说: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强调这种“自觉能动性”,并把它看作“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族类本性,强调运动、活动、劳动、实践、直接经验,从而强调产生和支配行动的实践意志,强调“精神变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似乎是毛从早年到晚岁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观念。

如前所述,毛在强调“自觉能动性”的同时,也强调对经验规律的客观性的认识,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即“实事求是”。这种经验论的唯物论,亦即“经验理性”保证了“自觉的能动性”不流于乱闯盲干,使在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② 同上,第759页。

命战争和革命的政治斗争中能不断取得胜利。

“自觉能动性”与“经验理性”本是被毛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好像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则前者（辩证法、自觉能动性方面）是作为本质、目的、世界观，后者（经验论、客观性的认识方面）是作为手段、方法、认识论，两者仍有主从的不同。

毛泽东这些哲学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革命战争的实际和传统实用理性的实际）的成果和产物，也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唯物论哲学不是以工具更新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唯物史观，而是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实践论”，毛泽东的辩证法哲学也完全不同于自黑格尔来的以“否定之否定”为核心的过程系统，而是与中国的《老子》、《孙子》有着更多承继关系的“矛盾论”。总之，毛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是思辨的理性，不是概念的体系，而是直接立足于也运用于生活、实践的自觉斗争和经验理性。从而，毛的哲学便不是静观描述的哲学，而是教人去斗争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它发展了马克思所要求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

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而且也是大政治家，他的军事论证总是在整体上联系政治，并作为政治的一个部分来展开的。而他从早年《民众的大联合》中所表述的最广泛地发动民众和团结人们的思想，经过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后，一方面发展为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人士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略（包括战场上的集中优势兵力、生产中的大兵团作战、批判运动中的“文海战术”），另一方面又发展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斗争又联合、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批评——团结”等一系列具体形式和方法。这是他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总结概括了许许多多现实斗争的直接经验而得出来的。它的确在广大的政治斗争领域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从思想史的层面看,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着重“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扬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把“改造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从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到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所谓“老三篇”,都正是这一时期的创作。而所谓“改造思想”,当时主要是针对作为干部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

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①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们知识分子……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②。

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从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773页。

② 同上,第808页。

③ 同上,第832,620—621,906页。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②

……

这些几十年来异常著名的、人们经过背诵的“语录”,它确乎是中国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极大地高扬了伦理道德主义。这个道德主义表现为,在残酷的生死斗争中对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的歌颂膜拜,表现为对比工农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复杂的精神世界里的种种污浊、肮脏、琐屑、渺小的批判揭发,自私自利、争名夺利、明哲保身、自由主义……被逐一地、详尽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检讨、揭发、展示出来,于是,不但使知识分子在出生入死的农民群众、军队指战员面前自惭形秽、自愧不如,而且也使他们在精神上、灵魂上受到了空前痛苦的磨炼、洗涤和净化。这就是毛泽东讲的要知识分子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变化”和“改造”不只是生

① 《毛泽东选集》。

② 同上,第832,620-621,906页。

活上的,而更是精神上的。但精神上的磨炼又被强调必须通过生活现实的磨炼来达到或实现。

刘少奇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正是把这个方面充分展开和发挥了,使这一方面成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刘正式提出个人“修养”问题:

要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①

其中,核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这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但是,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②

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131页。

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①。

刘少奇明确提出有名的“驯服工具”论,即为了革命,共产党员应该“把一切献给党”,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这就必须与各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情感作顽强的、自觉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共产党员的修养过程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②

只有长期进行这种自觉的思想修养,才可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诚恳坦白,团结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

刘的理论和他的这一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内享有盛誉。据说许多人在思想苦闷或遇到问题想不通时便读此书,反省自己,增进修养,从而得到解答。

当时是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和农村条件下,知识分子必须在农村和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打成一片,以进行艰苦漫长的对敌斗争,这成为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所以,毛、刘宣讲、发展道德主义在当时并不是空洞的说教或虚伪的装饰,而是有其非常切实的实际效用和实践成果的。毛、刘以“思想改造”和“自我修养”作为武器,在思想上情感上的确批判、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不利

① 同上。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1页。

于当时现实斗争和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习气、风尚以及具体人物,而不像其他共产党那样只以组织上清除出党为巩固队伍纯洁组织的途径。总起来看,强调思想改造、个人修养,确乎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改造运动,确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觉的革命意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革命实践活动。重视思想意识和个人修养便从此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我曾着重提到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章太炎认为道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章太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定,也多从道德着眼……,他对当时满清政府的官吏和改良派的斗争,也总是尖锐揭露对方个人道德的堕落、人格的低劣、……‘湛心利禄’、‘庸耻丧尽’、官迷心窍、趋附势利、佞媚谄伪、怯懦畏葸……等等。这种人身揭露的道德武器,在极端爱面子的中国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中,经常是使人狼狈不堪,能够取得很大战果的。”^①

在延安整风以及以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自我的道德反省和别人的尖锐批评,不也常常使人汗流浹背、无地自容么?

最有趣的是,章太炎从所谓道德标准出发,把当时社会分为十六个等级,……“一曰农人,二曰工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章太炎强调革命者必须讲求道德。……道德成为革命和

^①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一切进步作为的动力和目标。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不但在思想言论,而且在一定程度的身体力行上,都着重突出了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道德作风,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

“现代新儒家”则以另种哲学的理论形态突出了道德主义,他们强调孔孟程朱陆王的哲学传统,就是以“内圣”(“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来作为“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基础的。^②

可见,无论是下层或上层,在中国小生产传统社会里,道德主义或伦理主义在意识上、理论上、哲学上是有其强固的力量和影响的。因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影响、功过是非以及前景如何、如何估价等等,便是一个极待研究的复杂而重要的课题,特别在今天,尤其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中也有伦理社会主义,但它与中国这种讲求个人修养、非常注意“内圣”即个人的思想改造的道德主义,仍大不相同。

“毛泽东思想”^③这一术语主要是由刘少奇所大力倡导、阐发和定义的: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④

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

①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② 参阅本书《略论现代新儒家》。

③ 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指出,1943年7月8日王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论文中,“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人民日报》1986年8月15日)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①

综前所述,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是指辩证唯物论、党的组织理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基本思想理论,这里所指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了。

三 1949年—1976年

1949年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成为万众信服举世钦佩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国家指导思想。宣传、阐释、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思想的主题。以致有人嘲讽说,只有毛泽东思想,几亿人都未必思想了。而林彪后来就正是这样要求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49年的胜利,的确带来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再受百年来的各个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中国,1949年炮击长江中的英国军舰,五十年代出击美国于朝鲜,六十年代初又彻底与苏联决裂,确实证明中国已不再可轻侮。百年来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耻辱一扫而光。1949年的胜利也带来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自北京到边境,从黑龙江到西藏,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级级奉行,畅通无阻;不再是五十年来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了。数十年广大地域的人民不再受割据、战乱的蹂躏损害。1949年的胜利还带来了一个社会平等的中国,地主、官僚被彻底打倒,工农劳动阶级扬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眉吐气,经济收入、财产分配、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甚至在称呼、礼节等等各方面,广大人民空前地相对平等。这些都标志着五十年代初“解放”一词带来的社会含义:经济恢复,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开国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一场荡涤旧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的新鲜气象的胜利时期。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继续长久。曾几何时,大体在累积了数年之后,而以1957年为转折点,整个社会就逐渐陷于紧张、痛苦、匮乏、沉默、贫穷以至到最后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

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这与理论有何关系呢?

本来,在抗战中,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的中共纲领是明确提出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这个“新民主主义”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在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适当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政治上“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文化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总之,不是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1949年以后党内继续有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主张,但被毛泽东坚决否定了。当时强调向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中国革命于是很快就迈上第二步即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不断地批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

的错误。”^①

毛泽东本是批判“左”倾错误率领全党取得胜利的；至此，他却不断批判“右倾”，率领全党陷入了严重错误。

反“左”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分析了左倾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及其在革命中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具体表现而得出的基本符合事实的客观论断；反右则是从主观的革命要求、意志、观念、理想出发，并没有真正具体的材料事实足够证明“右”的存在。

毛泽东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要不“确”了。农业互相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②

可见，论证主要是建筑在所谓“不断变动”这种抽象的哲学观念之上的，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至少自1953年起，毛泽东就特别重视这种所谓不断的变动、革命和斗争。本来，按毛自己的规划设想，社会主义的农业手工业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即从公私合营到收归国有）应该与“国家工业化”并

①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1页。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和东欧迅速消灭资产阶级等等作为外部压力，亦应考虑在内，但毕竟不是主要的。民主革命中毛便顶住了压力。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行,至早在十年之内完成。但是,不到三年,^① 这种“改造”却提前超额地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则不过刚刚起步。

为什么会这么快?这种历史性的变动(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改变等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么?当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的疑问和讨论,即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农业小生产)基础上,如何可能有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的农业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及不久以后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呢?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物史观吗?

这在当年没有允许真正展开讨论。答案已经事先拟定: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②

于是在亿万农民和全国农村中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原定十五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突击”式的完成的。而所谓要同时“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却不但两三年而且十五年后也并未在广大农村出现。那么,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著名高潮以及以后的“坚持”“巩固”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毛泽东说:

① 其实无论十五年、十年的估计亦均无客观研究和科学依据,於是提前推后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①

毛泽东建国后的确用了很大力量去抓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他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上的不断革命:即由私有制不断过渡到由“低级”到“高级”的公有制。而作为这种“过渡”的动力则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于是,这种“斗争”本身便成了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保证”。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毛不断批判“右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掀起群众运动,以此来发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实现整个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所谓批判右倾,按毛泽东的规范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基本上构成了1949年后毛泽东所提出所坚持所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的主线。它首先表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以后又扩及整个经济领域,同时更表现在从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到反右派运动到所谓“红”“专”辩论等等意识形态领域中。毛泽东最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3—244页。

感兴趣和最关注的是农业和意识形态这两大领域^①，正是在这两大领域内，从建国以来，折腾的最多，最热闹，也最痛苦。毛泽东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坚持贯彻的便是这种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后毛便把这一“斗争”模式扩及全面工作和几乎所有领域：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②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③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④。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⑤

① “毛似乎是在当代最关心教育的政治领袖”“毛关于教育的许多观念甚至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有了”(E. C. Pischel, 见 Pick Wilson 编《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第 172、151 页，参阅《青年毛泽东》。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90 页。

③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年 8 月 16 日)。

④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 年 1 月)。

⑤ 《人民日报》1966 年 10 月 1 日。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的是 1949 年建国到 1957 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专门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在这方面不很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这种推演又正是从他所熟练运用的军事——政治思维来进行的。毛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讨论、研究、规范经济,而这亦即是毛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的“政治挂帅”。毛经常强调的是: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 and 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

所以,不是经济、更不是科技决定思想和政治,而必须是思想、政治“挂帅”去决定、主宰、领导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切。

毛的这种思想的来源,正是 1949 年前的战争经验。例如: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②

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③

① 《工作方法(草案)》(1958 年 1 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3,1144 页。

③ 同上。

.....

由于强调政治挂帅、阶级觉悟,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而“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又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两军对战,于是弥漫在政治、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治。例如,哲学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历史上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军对战”;文艺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两军对战”;“百家争鸣”实际也是两家^①……。至今为止,与军事毫无关系的日常生活和书面语言中,便仍然充满了“战役”“战略”“制高点”“突击”“突破口”……等等军事术语。

但是,为什么 1949 年建国以后就应该立刻向社会主义过渡呢?为什么自此以后就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为什么即使在合作化全面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斗争呢?为什么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的封建主义,反而不必去斗争了呢?……

并没有多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客观论述,有的只是这种哲学推演:整个宇宙、世界、社会既然是靠矛盾、斗争来推动和发展,那么地主阶级消灭了,“理所当然”地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两军对战”来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这好像是从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辩证唯物论所必然推论出来的结论。而且既有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后强制进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为范本,又有在长期军事斗争中所积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9 页。

累的“两军对战”的观念、习惯以至感情,就似乎更证明着上述理论的正确,这正是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甚至信服的一些基本原因。

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不少人也写了不少阐述文章,很大部分都说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你看,先改变生产关系(合作化),后发展生产力(机械化);突出政治以统帅经济;强调思想改造以建造共产主义新人……;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至斯大林所并没有或很少讲过的。

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时期强调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批判了它,把它倒了过来,强调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斯大林写了辩证唯物论之后毕竟还写了历史唯物论,尽管把后者只当作前者的演绎和应用,毛泽东只写了前者(如《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脍炙人口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并不就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恰恰又是“辩证唯物论”的直接的政策运用。从而,毛泽东所注意并强调要改变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便主要不是那些不适应现代生产力(大工业、科学技术)的部分,如小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观念习惯等等。不是向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科学、法制、经营管理的合理化、事业化和培养大量知识分子人才的方向前进,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毛泽东以他所熟悉的农业小生产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观念、习惯和理想,强调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变世界。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应该不断地组织作战,不停顿不间断地进行革命,以保持群众不断高昂的革命热情,才能推动社会前进,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那么,什么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由于没有进行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种种概念

和观念便始终处在非常模糊朦胧的状态中。它无所不包却似是而非。当不断地人为地制造运动,把这种“两军对战”理论模式普及到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去时,便很容易极为简单化地把一切坏的事物、现象都归入为以“剥削”为基础的所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范畴,把一切好的事物、现象都归入以“劳动”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范畴。于是,在这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便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对立和斗争。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便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现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变成了道德,道德变成了政治。^①

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便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变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认为是它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无论是讲革命,讲建设,强调的总是“群众中孕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②,“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雷锋同志学习”……。

如我们所知道,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是有其深厚的基础的。不仅封建社会本就以伦理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核心,宋明理学的“克己复礼”“正心诚意”曾经是长久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官方正统哲学,它已成为人们所熟悉所习惯的文化心理;而且更由于新旧中国的交替,确乎使人们对经历

① “政治挂帅”“先红后专”等等与中国传统的所谓“内圣”为主、“内学”为本(张之洞:“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启世事”《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论在实质上有相似处。参阅《漫说“西体中用”》。

② 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含着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和统一的内容在内,这与青年毛泽东以发展身心为道德有思想上的相承处,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处暂略。

了残酷战争取得胜利的革命和革命者(“老干部”)在伦理道德上有极大的尊敬。对旧的黑暗社会和生活形态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唤起了也培育着人们对革命、对革命道德、对集体主义、对自己牺牲精神的忠诚的热情和极度的信任。于是,个人利益以至个人本身当然包括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不仅都是渺不足道的;并且都作为异己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真正重要的是集体的、国家的、革命的事业和利益,“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也就是“先公后私”“一心为公”和“舍己从公”。

也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各方面日益加强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行政权力通过共产党组织支配一切和干预一切,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到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如工作、迁徙、婚姻、恋爱等等)。于是,一切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政治的地位、权力、等级成为社会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标准和尺度。于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作为社会动力的似乎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了。这样,共产主义也不再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成了某种政治——道德的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亦即“政治觉悟高”的圣贤。连历史人物也纯以道德作为评价标准(文革前夕关于李秀成的讨论)……等等,等等。

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距已相当遥远了。“政治挂帅”和道德至上使置根于小生产保护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披着新装上市。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上,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从文化批判开始的,这“文化批判”又正是继承着自批《武训传》开头的建国十七年来一系列名为“文化批判”实际是政治批判而来。“文化大革命”批判得最凶的文艺“黑八

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①)便都是文革以前提出批判的。在经济、哲学、史学领域,也如此。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也是从俞平伯、冯友兰到周谷城,即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一以贯之的。不同在于文化大革命公开声称“实质上是场政治大革命”,并且主要矛头指向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当年同艰苦共患难打下了江山的老干部。但是,这也是与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到四清运动整基层干部的路线进程一脉相承的。因为,反右派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毛的斗争哲学便主要指向党内。

这也有其现实原因。数十年艰苦奋斗的战争环境毕竟过去,和平时期使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日渐突出出来,供给制在五十年代初期为薪金制取代,人皆同志日益被各种等级官衔所规范,战争时期为集中意志反对“极端民主化”而强调命令、集中的习惯,这时演化为封建性的官僚主义和观念、制度上的等级主义、服从主义。“一言堂”“唯上是听”“当官作老爷”日益在时间和空间中蔓延开来,封建主义的影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包括旧中国的封建官场恶习),在解放初期被冲击后再次迅速地以新的形态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

于是,人民群众充满着不快、不满和愤怒,特别是在敏感的学生群中。“文革”之前就不断有过“学生闹事”,抗议官僚主义,反对各种落后体制。1957年的“鸣放”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文革”中,他便指出群众有气要发泄。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

^① 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领导,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如此迅风疾雨地发动群众自发地搞了起来,人人参加,来势猛烈,毁坏力极强,其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所以,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或简单描述为一场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便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分,但当时广大群众包括知识分子而特别是青年学生是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的。这一基本史实和主要方面,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

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①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而毛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也在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娴熟可以从心所欲的晚年中,充分展露了出来。毛的“造反有理”的观念情感、浪漫的反叛欲求,从少年到晚年都一直存在,也表现在他生活的各方面,只是有时被理智自觉压抑下去(如中年领导民主革命和晚年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需顾及各种客观现实条件),但有时却由于有理论武装(如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理论)而更加突出了。对“破

^① 章士钊《柳文指要》。

坏一个旧世界”的兴趣，使毛从孔夫子到新文化、从党^①到政府^②的各种权威，一律加以批判和否定。“不破不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③但从早年起并在中年获得重大成功的“经验理性”却越来越被推置一旁，这当然与毛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社会生活有关。毛原来制衡得很好的自己的思想构架，自1949年以后便开始片面发展，到“文革”达到了顶峰。

例如，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毛总怀念着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首先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大跃进”中，所谓“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曾被毛所肯定而普及全国。毛不再真正深入地注意研究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

此外，当然就是上述的道德主义。从大跃进时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到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④，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并非突然产生出来的，它们是既有其个人思想的由来已久的根源，又有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

① 外国研究者特别注意毛在“文革”中“摧毁党”的特异作法，并认为毛一直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看法。毛在青年时期确接受过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但似乎主要在于接受这一思想的反束缚和乌托邦理想社会方面而不在其非组织、反权威方面。接受马列主义后，毛一直是强调纪律、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要求“消灭……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7页）。所以“文革”后期当《人民日报》批评“文革”造成无政府主义，毛大不以为然。

② 如“一月风暴”后成立上海公社后改为“革命委员会”，而不再叫“政府”。

③ 参阅《青年毛泽东》。

④ 到“文革”后期，某些地方连工人阶级也要下放劳动去“向贫下中农学习”。

林彪和“四人帮”便在这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作了“得力的助手”，他们在思想上谈不上什么自己的东西，但他们（特别是林彪）却的确把毛的上述某些思想发挥到了极端，例如为毛泽东所肯定的林彪“四个第一”的思想：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此外，如林彪说：

……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爆发出很大的力量。

共产主义就是讲的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要破私立公，……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位“林副统帅”（当时全国在形式上编为军队，所有机关单位都以军队建制）所“发展”的，不正是毛泽东许多思想的完全唯心主义化和封建主义化么？

林彪并直接倡导封建形态，把个人崇拜仪式化，如编制“语录”，搞“天天读”，把毛泽东的言论说成“最高指示”和“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其实也来自军队习惯），以及搞“天才论”，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等。林彪不但在思想上而且也在组织上（如党章居然写上“接班人”名字）企图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建立起子承父业的公开的封建王朝。

但是，重要的是，在林彪摔死事件发生以前，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为什么对这一切并未感到格格不入而奋起抵抗？为什么

广大群众、干部和学生都默默地接受了林彪搞的这大大套？当然，高压下的沉默并不等于真正的认同，但也确有不少的忠诚的信奉者，甚至在广泛的知识者之中。这就是因为，一则这一套有其传统的社会意识的根基、习惯，如“最高指示”与“圣旨下”连词句上也无多大区别，这与至今包括知识界也仍然接受甚至欣赏“伯乐”、包公、好皇帝属于同一传统意识和心理积淀。二则，这一套也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它们是过去十七年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等等的延续。把“革命”当作目的本身来歌颂、崇拜和追求，把毛泽东作为偶像来崇拜，特别是把“老三篇”、“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道德意识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一切，这是由来已久了。公私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分，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如今这一套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出现，便似乎成了最新最革命也最中国化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它，它从而使任何人（人总是有缺点、弱点和错误的，人总是有各种物质生活的要求、意向、愿望和享受的）都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必须深刻检讨，努力忏悔……。在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王杰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至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烈士面前，你能不自惭形秽、彻底悔过和无条件投降么？你能不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吗？能不为此而接受审查、批判，忍受痛苦、揭发别人和改造自己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总要反复强调“老三篇”、“破私立公”之类的秘密。

这里，与传统不同在于，这一套道德主义和公私义利之分是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贯串的，从而不再是比较复杂的、以稳定、和谐为目的和特征的传统的伦常观念，而是以更简化的“革命”的阶级观念来作为标准、尺度，这种公私义利、天理人欲的分辨更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公开的、“你死我活”的十分激烈的斗争性质。不仅在

现实中,而且在心灵中。在革命旗帜下,在道德主义的要求下,人们都不但理知上要认为,而且要求情感上也感到自己确有错误,确需改造,确需勇敢卫护革命,贡献自己。于是不断检讨自己,批判别人,揭发“罪恶”,划清界限,指责、悔恨自己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喜爱或“放松警惕”……。于是,有千千万万热情献身的红卫兵,有千千万万真心忏悔的老干部,有千千万万虔诚请罪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种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斗争、检讨的运动就这样发生了。奇怪吗?也并不奇怪。如前所说,它不但是几十年思想改造和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自然结果,而且也与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精神不无关联。

林彪“自我爆炸”的事实,“571 工程纪要”的公布才从根本上唤醒了人们,这倒的确像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炸醒了人们的痴迷和恶梦。原来一切都是假的,高举“语录”天天喊“三忠于”、“四无限”^①的人原来是一群最大的骗子、坏蛋、野心家。什么“破私立公”,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什么“四个第一”,什么“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多么虚伪多么卑鄙多么可笑!政治终于揭开了它自身的丑恶,一切原来化为道德的伪装愈发显示出了这道德本身的虚假。人们确乎被惊醒了,重新用自己的常识和健全的理知来观察、判断,来估计现实、生活和历史。以前的一切怀疑、问题、看法、意见一下子便明亮地被证实被想通了。当然,有从一开始甚至从五十年代初便有过正确的疑惑和深刻看法的人,但毕竟是极少数,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通过“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而觉醒的。

^① “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

“文革”是一个重要而漫长的故事，非本文所能详论。这里只想提出值得注意的两点：

一是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尽管其中有某些类似宗教狂热的成份，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在激烈派仗中的自我献身，如无端的兽性发泄、疯狂破坏和虐待狂式的酷刑取乐，等等，但其主体却仍然是以普通理知为基础的，即它是以一整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道德理论即关于公私义利、集体个体、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等等为根本依据的。它仍然具有普通理知上的可接受性，它仍然是一种理性的信仰、一种道德的宗教。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譬如德国的纳粹运动、高扬道德主义的“斗私批修”理论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不同或貌同实异之处。把二者等同视之，是既忽视了社会土壤的不同，也轻略了传统的本质差异。德国传统精神中的那种盲目冲动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是并不相同的，混淆它们无助于清醒地去认识自己。

另一是，正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至少在指导思想）仍在理知的主宰、支配下，所以对情感和人性的扭曲也是通过理知来进行的。正是这样，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苦痛和心理上的无比折磨。它要求人们从理知上去接受、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判断一切”，去“分清敌我”、“划清界限”，要求人们从理知上运用“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标准来检查自己、反省自己，这样才能做到“六亲不认”“大义灭亲”……。于是社会上和传统中原来相当浓厚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人事关系和情感联系，便统统要求用这种阶级斗争的“革

命的”道德主义或者说革命的集体主义去破坏和取代^①。不是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要求一切情感必须经由“理性”批准,必须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能容许的唯一的感情是“革命的”“阶级感情”,一切人间的情谊、人际的关怀都必须放在这个新的道德标准下衡量估计、肯定否定。在这种“理性”的主宰摧残下,人们付出了极为高昂的情感代价。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互相凶狠地毫无情面地揭发、批判,虔诚地忠实地穷根究底地交代、检讨……。这里面有多少的痛苦、眼泪、血汗和生命!这里面造成了多少的人格分裂、精神创伤和人间惨剧!

当然,还不说那些借“文革”干坏事或思想污浊行为卑劣的人们,因为那是任何社会、时代和动乱时期都有的。尽管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这场“革命”中以及之前之后获得了暴利,但就整个社会和整个运动来说,毕竟居于次要的位置。

居主要位置的广大干部、群众在这场革命中,不但个性而且人性也遭到摧残扭曲,这种摧残扭曲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理性控制主宰下,由自己积极参与而造成的。这才是真正的巨大悲剧。

难道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这样的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竟会结出如此难堪的果实?

为什么?为什么?……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开始怀疑着、憎恶着、思索着。

① 在原始儒家本有所谓“子为父隐”(《论语》),舜弃天下窃负杀人的父亲而逃(《孟子》),都显示出血缘氏族的伦理本色。自秦汉以后,在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中,则多半“忠”高于“孝”,以国家名义的皇帝命令高于亲属要求,此即所谓忠君爱国的传统道德,这一切都以“革命的”服装在“文革”中上演。这里面尚有些有趣的复杂问题,暂略。

四 1976年——

一声惊雷，毛氏逝世。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四人帮”很快就垮台，“凡是”派也没能支持几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以学术出现的政治命题在开始扫除人们走向新时期的思想阻碍：不能一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必须从实际——人们的现实实践出发。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的理论成果，它在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之后，也就没能再继续。

真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展示出新时期特点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把从上到下整个社会中的传统的与革命的信念、原则、标准统统破坏了，人们在思想、心理、身体、生活各个方面受到了空前的痛苦和损伤。人们或被迫或自愿地出卖自己、践踏自己、丧失掉自己。人不再是人，是匍伏在神的威灵下的奴仆、罪人，或者则成了戴着神的面具的野兽。

于是，神的崩溃便从各个方面发出人的呐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年代最强音。它在文学上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也在哲学上表现出来。它表现为哲学上重提启蒙，反对独断（教条），反对愚昧，反对“异化”，表现为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盛极一时。当然最集中地表现为呼喊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或归纳或规范）为“人道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中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等。这当然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数十年把马克思主义强调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彻底反动，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否定。

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人道主义性质是不错的，但把马克思主

义解说为人道主义,或以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却并不符合马克思当年的原意。因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它既有科学的内容,也具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这种历史观,或者说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不可能是历史观,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来说明人的存在或本质,必然带有空泛、抽象或回到文艺复兴、启蒙主义的理论上去。人道主义强调“人”,主要是个体、个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的人,主要是从人类总体出发,然后讲到个体。制造工具的“从猿到人”的“人”,并非个体而是群体。只有到共产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的这种自由是以人类总体的历史性的行程为前提的。从而在这个行程中,“个体与群体、小我与大我到目前为止具有某种有时甚至是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需要作具体分析……”。东、西方目前有关的一些讨论有其具体历史的合理内容,在东方是反对封建官僚,在西方是对资本社会中各种异化的抗议。它们都要求人在‘物’的奴役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要求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实践活动的真正主宰,因此都提出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问题。……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

“重视个体实践,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也就是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我们一方面反对非决定论观点,因为无论如何,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从农业小生产到工业大生产,历史在进化,物质文明在成长,其中确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法则,否认这点是不符合事实

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类中任何个体自我的实践都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其中充满大量偶然因素。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体性意义所在”^①,才不致于重蹈过去道德主义把道德呐喊建筑在被异化的“集体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宿命基础之上的谬误。因此,一方面应该反对在“革命的”“集体的”旗号下种种抹杀、轻视个体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我”(人类总体)与“小我”(个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行程,用义愤、感伤、情绪以及价值判断、伦理原则是不能真正解释这个行程的。人道主义理论就有这方面的毛病。所以,我也仍然认为,“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极为肤浅和贫乏,它不能历史具体地去深入分析现象,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任何历史事实,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相,从而经常流为一堆美丽的词藻、迷人的空谈、情绪的发泄。”^②“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是在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历史本身就是这样”^③。用感伤、愤慨、好心来对待历史,用人性、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是幼稚和不科学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也是相当模糊的,“出发点”是什么意思?“人”又是什么意思?指个体还是指总体(人类)?便不清楚,首先便需要作番语义分析才能了解。可见,提倡人道主义虽有其现实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作为哲学理论,还需要仔细研究、充实和提高。如果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而不加以严格的科学论证,那它就还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理论创

① 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

② 拙文《夜读偶录》,《瞭望》1984年11期。

③ 《美学与艺术讲演录》第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新。

但是,意识形态并不等于科学,也并没有所谓完全正确的理论,何况在理论上并不正确的东西在历史上有时却可以起进步作用。^①在粉碎了“四人帮”、中国社会进入“苏醒的八十年代”^②的时候,多么必然也多么需要这种恢复人性尊严、重提人的价值的人的哲学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这些口号、观念充满着多么强烈的正义情感而符合人们的愿望、欲求和意向啊!它们在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主义、“集体主义”的罪恶,表达对各种压迫、迫害的抗议上,多么切中时病啊!尽管它在理论上相当抽象、空泛、贫弱,不能深刻说明问题,而且情感大于科学,但是,它们表达了人们压抑了很久的思想、观念、情感、意识,激起了人们与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旧传统相彻底决裂的斗志和决心,唤起人们去努力争取被否定了和埋葬了的个人的人格、个性、生活权利、正当欲求……。所以,说“一个怪影在中国知识界徘徊——人道主义的怪影”^③便是有其真实的现实依据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思潮,尽管被大规模地批判,却受到广大知识分子以至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它能与经济改革同步,配合和支持着改革,把社会推向前进。因为它们是在继续清算文化大革命,是在继续与封建主义作斗争。这也很清楚,为什么批判者们尽管引经据典,大造声势,力加驳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并不是人道主义,却始终应者寥寥。这些批判文章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提倡伦理价值,呼唤献身革命等等,一切似乎都很

① 恩格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列宁重复了恩格斯这一论断并指出要“记住恩格斯的名言”(《列宁选集》第2卷第322、431页)。

② 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末章。

③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第217页,三联书店,1986,北京。

正确,但却是几十年来人们早已熟知的论调。由于被“文革”以来的事实所彻底败坏,人们对这些老调不但不再信任,而且相当反感,于是对这种批判掉头不顾,置之不理,毫无兴趣,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从理论上说,这种批判的根本弱点,正在于它没能具体地科学地考察中国这股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厚的现实根基、历史渊源和理论意义,也就是说,这批判没有注意到这股人道主义思潮有其历史的正义性和现实的合理性。批判离开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仍然是就理论谈理论,从而这批判也抽象、空泛、贫弱,离开了正在前进中的中国社会实践,它当然不能取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正像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如何前进的关键时刻一样。马克思主义之需要创造性的发展和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在中国这样突出。从五六十年代东欧、苏联到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潮流,共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本身由于强调社会忽视个体所带来的巨大缺陷,但并未真正开辟如何走向未来的理论通道。如何概括总结百年来的世界经验,如何概括总结数十年中国经验,将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和远为艰难的工作,它也将经历异常困难、复杂的漫长过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里只想最简略地说两点。

第一,应该回到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应明确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辩证唯物论等等是后来推演出来的)。历史唯物论又可以分作哲学层和科学层两个层面。后一层面将具体地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国家、法律、文化、科技、家庭……等等问题。它将或分化或渗入或成为许多专门的社会科学学科。美国一些马克思学者用现代分析哲学、数学博弈论等等来解释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加科学化,是很值得注意的。

就哲学层次说,历史唯物论即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或称人类学本体论。它应包含工艺社会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和文化心理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主观方面)这样两个方面。提出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主体性实践哲学的一个方面,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要求总结过去,认识自我(民族、社会、时代)。例如,如何在所谓“迷信中忍耐,保守中沉默”的国民性中,在上述道德主义的传统经验中,认识到它的致命的缺陷和仍然值得保存、发扬的优胜处,便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程。

第二,对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的研究,需要改善和加强。这又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发掘经典作家本人由于当时现实斗争的各种原因没有或未来得及展开的思想、观念、学说、主张。“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早期在建立自己的整体世界观的进程中,具有多方面的异常丰富的思想,但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多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时代的需要,充分发展了他的世界观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并非全部。……由于当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马克思本人专注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理论和实际,马克思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继承者如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李卜克内西、梅林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第二第三国际等等,都主要发挥发展了有关这一方面的理论学说……,而把《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中尚未详细论证的其他一些重要的、珍贵的思想忽略过去或暂时搁置起来了。”^①这就把任务留给了我们。“人化的自然”思想便是一例。“人化的自然”不只是美学问题,它是一个根本哲学问题,是涉及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人性塑造问题,亦即涉及人的本质和存在问题。

^① 拙文《艺术杂谈》,《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

第二个方面是重新审查、鉴定经典作家的论著、思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应再采取对待宗教教义的注经方式和迷信态度。例如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否有基本理论(唯物史观)和战略策略(期望和号召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矛盾,便需要研究。当年,整个世界范围内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马克思却期待德国的民主革命将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即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一例。即使在基本理论范围内,是否也有问题和矛盾呢?例如,对工具的使用、制造、更新,本是马克思所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点。因为正是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资本论》中,是否有脱离不开工具,只着重分析论证“劳动力”的支出、买卖和创造剩余价值,而相对忽略了在劳动中科学技术、工具变化所带来的种种有关创造价值及剩余价值的问题呢?当科学直接成为生产力的今天,如何估计工具的巨大作用,如何计算与此有关的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力”以及白领工人的地位等等问题,不是日益突出了么?从而,马克思主义应否看作只是(蓝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更应是表达了人类总体的历史前景和知识分子的热情信念?

又例如,列宁关于管理国家的思想理论,也值得重新研究。《国家与革命》是列宁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认为: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

……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

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再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①

毛泽东晚年的某些乌托邦思想,如人民公社,群众专政等等,也有与此类似之处。

……

但几十年来高度发展了的现代生活,却恰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不是变得十分简单而是更为繁忙复杂,更需要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专门家来主持操管。威伯(Max Weber)关于工业大生产必然涌现出一个技术和行政管理者的官僚阶层的理论,反而更加符合事实。在政治制度上,列宁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议会制度予以猛烈抨击,所以十月革命后便加以废除而代之以工兵苏维埃。苏维埃在革命初期的列宁时代的确比议会制更民主,任何士兵代表、工人代表都可以在苏维埃上发言、争辩、讨论,但曾几何时,苏维埃制度在斯大林手上却变成了一块橡皮图章。所谓“代表”只剩下举手的荣誉了。由于苏维埃兼有立法与行政职能,似乎最大限度发扬了民主,让所有劳动者都参预国家管理;但同时却为少数几个人以至一个人的高度集权、甚至独裁专制制造了条件,因为再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众多法律以及舆论之类的束缚限制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党专政,以至最后变成了斯大林一个人的独裁。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07、212—213页。

这些历史教训难道不需要从理论上重新加以检讨、研究吗？

总起来看，“自第二次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纷纷成立，构成了庞大的第三世界，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猛增，跨国公司的强壮，中小工业的繁荣，白领工人的扩大……，使世界的经济、外交、文化日益在进入一个新的多元化的阶段。……就中国说，时代最大特征之一是开始结束了几十年和几千年的封闭状态，中国文明将第一次跨入世界之林，与其他文明作真正的对话和交流。物质文明在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该怎么办呢？

……到目前为止，许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诚然，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但它不只是这种理论。在现时代，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光坚持或只谈革命的理论，就不够了。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尽管曾经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但无论如何，阶级、阶级斗争、革命都只和一定的历史阶段联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它毕竟是比较短暂的现象。不能天天革命，岁岁战争。阶级斗争不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阶级迟早还要归于消灭。如果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批判、革命，老是不断革命，这就要走向反面。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最沉痛的教训吗？所以，我认为，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更是建设的哲学。不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建设，而且因为建设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更为长期的、基本的、主要的事情，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光批判，是并不能建设出新文明的。我们要

从人类总体的宏观历史角度来鲜明地提出这个观点。^①

① 拙作《艺术杂谈》，《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